

# 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

李向东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 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称的郑观应,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巨大,其完整的维新改良思想体系成为民主与科学口号提出的先导。然而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却有两件事让人费解,也让人齿冷,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

[关键词] 郑观应;改良主义;经元善;维新变法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 一

1998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仓皇出逃,慈禧太后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缉,悬赏捉拿。上海为当时的交通要冲,又是康梁的活动据点,受到清政府的严密搜查。9月22日,上海道蔡钧接到南洋大臣刘坤一的密电,“速觅线派人并知会英领事逐船搜捕”由天津渡往上海的康有为<sup>[1]</sup>,并要蔡钧密商于盛宣怀,协助查拿。蔡奉命而行,于9月23日致函盛宣怀,要他“如遇差捕上船查拿,毋任稍有阻格”<sup>[2]</sup>,协拿钦犯。就这样在上海布下了天罗地网,专候康梁入瓮了。

事实上,就在9月22日(光绪廿四年八月初七)这一天,郑观应已密函盛宣怀:“顷闻梁卓如扮日装到沪,想小田切总领事必知确否,今相见可询之”,并嘱咐盛宣怀“不可说闻于何人”,还要求“阅后付丙”<sup>[3]</sup>。这寥寥数语是何等的及时,何等的重要!郑观应的良苦用心也就跃然纸上了。我们可以推测盛宣怀有可能向郑观应询问有关康梁下落的问题,而郑观应也可能知道盛宣怀会负有搜捕康梁之使命。虽然蔡钧的信晚于郑观应的密函一天,但就郑观应当时在上海政界商界的活动能力、活动范围而言,这位信息灵通者肯定会知道些有关上层人物密谋的蛛丝马迹,密告也是自然的。从另一方面讲,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非同寻常,郑观应可以说是盛氏集团的一个得力干将,时常向盛宣怀出谋划策;在政治上紧紧依附于盛宣怀,而该密函也是为盛宣怀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最佳方法。那“赏银十万两”,“如不愿领赏愿得实在官阶及各项升衔,亦必予破格之赏”<sup>[4]</sup>,也是相当诱人

的。因此郑观应的密告也必然会尽心尽力的。

夏东元先生在他的《郑观应传》一书中认为这一密函“没有什么恶意”,也不至于“有陷害性”,理由有五:一是盛宣怀接到郑观应的密函时,并无协助捉拿康梁的任务,郑函早蔡函一天;二是英日等国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进而对以康梁为首的维新人士采取庇护态度,如果郑是出于陷害性的告密,是不会要盛宣怀去询问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之助这个知情人的;三是盛宣怀也惧怕列强干涉,不主张对维新人士逼迫太甚,采取息事宁人态度。他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曾说:“深宫似不可再有举动,以防彼族干预内政。”<sup>[5]</sup>这些想必郑观应也能揣测得到;四是郑观应与康梁没有利害冲突,没有置之于死地的必要;五是盛宣怀对康梁,尤其是梁启超的才干非常欣赏。因此说盛宣怀并无捉拿康梁的积极性,郑观应也无促使盛宣怀去捉康梁之意,从而说郑观应的告密不具陷害性。只是郑观应为什么要给盛宣怀一封如此重要的密函,并且还嘱咐他“不可说闻于何人”,“阅后付丙”呢?既然“不见恶意”,这些举动不成多余无聊的吗?这实际上是郑心虚的具体表现。再者,如此大要犯对每个政客而言,岂不是一笔可观的政治收入吗?那诱人的悬赏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这一点郑观应还是最为了解的,并且从内心里也希望盛宣怀能有某些具体行动。而该密函对于盛氏集团的利益而言,郑观应也总能掂量出个中的份量来,他也肯定不会是让盛宣怀来保护这位变法勇士的。回想起郑观应对康梁的评价“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sup>[6]</sup>、“事速则不达,恐与大局有损无益”<sup>[7]</sup>来,

[收稿日期] 2000-12-21

[作者简介] 李向东(1970—),男,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从事近代史学习与研究。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焉有“不具陷害性”之理?

其实,郑与康梁的关系本不融洽,对他们的评价也很低,因此也有可能因人废事而不赞成变法,也有可能再因事废人而密告康梁之行踪。他认为康梁为戊戌祸首,加之“康梁到电局未到商局,拙作未求一序,彼亦未编入其所辑《经世文续编》中”<sup>[8]</sup>等原有的成见与愤恨,密告也自然顺理成章了。而郑观应为了掩人耳目,还托人给康有为的父亲百金以避难澳门之用,言辞恳切,以示真诚,并为此还小造声势,似乎要让世人明白其高尚的为人。

郑观应同样也会明白,这消息一旦泄露出去,为当局所了解,那将是什么后果,又怎能会“不具陷害性”呢?好在康梁二人福大命大,没有落网,最终才真的不具陷害性了。

## 二

经元善,字莲珊,浙江上虞人。起初与谢家福等人创办义赈,后与龚寿图、郑观应等人筹办上海织布局,不久被委任为电报局会办,并接替谢家福总办上海电报局。他与郑观应在 1878 年创办义赈时相识,关系日深至达“交融水乳”,并与 1881 年结为金兰之好,按经元善说是“契合之好,沆瀣一气,不只义闻各省,且曾上达天听。”<sup>[9]</sup>但是在关键时刻,郑观应却杀了个回马枪,这背后一铜是经元善所始料不及的。

事情是这样的:1900 年 1 月 24 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四日),为穆宗毅皇帝(同治帝)立嗣的硃谕下达至上海,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得知慈禧太后欲废帝立储,改元“保庆”的消息后,于 26 日上书总理衙门,领衔电诤,说“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调兵干预之说”,并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sup>[10]</sup>,对“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之举力谏,请求撤命。这显然与西太后相背而行,因此获罪,成为奉旨要犯。其时正在北京的盛宣怀闻讯后,于 1 月 28 日立即密电郑观应、杨廷果二人劝经元善迅速辞差远避。于是在郑观应的安排下,经元善于同日携眷南下,2 月 1 日抵香港,后落脚澳门。郑观应还函托其在澳门的挚友、亲戚叶侣珊等人多方照料经元善,为此事他也算尽心尽力了。

可是,就在 1900 年 1 月 29 日(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九日),盛宣怀却受到言官余诚格的参劾:“电局委员聚众妄为,危词挟制,通同一气,纵令潜逃,请严旨勒交,以伸国宪。”<sup>[11]</sup>2 月 8 日勒交经元

善的上谕下达,称经元善“挈眷潜逃,难保非有人暗通消息,嗾使远遁”,经又系盛宣怀“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知其踪迹”,责成盛宣怀一月内将其解拿归案,“倘不认真查拿,一任远遁,定惟盛宣怀是问”<sup>[11]</sup>。于是这就触动了盛氏集团利益这根神经了,而郑观应这位得力干将不得不操刀,捅向经元善了。

当时知道经元善行踪的只有郑观应了。盛宣怀在十分焦急中根据李鸿章的“密询郑陶斋及港局廖委员,必知其踪迹”的指示<sup>[12]</sup>，“昨询郑道,据闻往来港澳,踪迹甚符合”<sup>[13]</sup>。终于在 2 月 25 日下午将经元善诱捕归案,拘留于澳门大炮台一年有余。诱捕者乃是郑观应的至亲至友并照顾经元善的叶侣珊。直到经入狱后方醒悟出来:“与叶素昧平生,今诳言计诱而下此毒手,想必奉命不得不尔。”<sup>[14]</sup>奉谁之命,可能尽在不言中了。郑观应要求照顾经元善的人是叶侣珊,而诱捕经的人也是他,如此的巧合,自不待言了。

事后,郑观应又于 1900 年 3 月 5 日(光绪廿六年二月初五)给盛宣怀的信中极尽夸张之能事,斥责经元善辜负了盛对之的栽培,不知图报,“反如狂如醉听从报馆文笔干此弥天大罪,累已累人”,并诬告经元善称电报“列名者,大多不知情,由经擅为开列上达”为了避免牵连,还声明他通知经元善出亡是因为“当时不知其欠巨款”,并随声附合,要求经元善“清缴公款”<sup>[15]</sup>。那么,郑观应为什么会如此出尔反尔,初则密示经元善出逃,并托人多方照料,继则向当局告以行踪,并多方诬蔑呢?我想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织布局的事。1884 年郑观应在经办上海织布局时,经营不善,加上国际经济形势不景气,局未开而先亏本,并且他与先后承办布局的彭汝琮、龚寿图不和,龚曾向李鸿章控告郑观应“擅挪公款,受押股票利则归己,害则归公”<sup>[16]</sup>,还将“布局同人欠款尽诿于”郑观应,而受命查办布局的经元善在清理帐目时,又毫不留情面地向龚寿图催索龚挪用的八千金局款,且将此事报告给了李鸿章,龚以为是逼人太甚,借此迁怒于郑观应。由此郑、经二人不可能不心存介蒂了。

其次,盛宣怀个人的权利欲极剧膨胀,经元善为之不满,从而发生矛盾,矛盾发展至为办女学堂筹款一事上而达顶点。1897 年经元善为维新事业而筹办女学堂,曾商于盛宣怀,后来由于顽固派的群起反对,盛宣怀也畏缩不前了,后来干脆他不仅

自己不捐款,还利用职权之便,处处掣肘,连经元善原打算从电报局二十万公积金中提出一部分来维持女学堂开支的款项也禁止发给了。经元善对此愤怒至极,于1899年6月写信给郑观应,痛批盛宣怀“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sup>[17]</sup>。而郑却把此私人信件转交给了盛宣怀,这势必扩大经盛二人的矛盾,由此也派生出了经郑间的矛盾,因为郑观应是不能容忍别人对盛氏集团的利益有所损害的,因此他也会毫无原则地偏袒盛而鄙视经的。郑观应也在女学堂捐款一事吝啬不合作起来,虽然他当时的收入相当可观,却以穷得很敷衍,非常消极,毫无掩饰地扩大二人间的矛盾。经元善认为郑不愿捐款的冷淡态度“谅有难言之隐”,想必他也许认识到了这与盛宣怀的态度变化有关,矛盾的扩大化与公开化也是自然的。

戊戌政变后,1898年10月3日郑观应致书盛宣怀,对维新变法中所创办的女学堂无人参劾表示庆幸,这实际上是一种向当局透露信息、为盛氏集团利益增砖添瓦的具体表现。及至后来清政府要追查女学堂一时,郑观应又很庆幸自己那时的消极暧昧态度,说什么“女学堂初议之时,官应本不与闻,因莲珊各友再三相劝,事属善举,是以勉从。”<sup>[19]</sup>用这种“本不与闻”与“勉从”为自己开脱责任,还有诱过于经元善之嫌疑,也是他在维新活动中图以自保,见风使舵,诱过于人的一种具体表现和鲜明例证,这确实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君子行为。经元善当然心中甚为不快,而他对郑观应此时已沾染了浓厚的官气也十分鄙视。

最后,由于经元善曾与康梁来往过甚,关系较

深,而郑却与之“交谊泛泛”,有一定的隔阂,这也很有可能引起郑观应的猜忌与不满。

由上所述,经元善与郑观应之间的矛盾虽非十分尖锐,却也不小,这投井下石,反噬同类的行径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然,这两次不义之举和郑观应在启迪人们思想方面的贡献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是白璧微瑕而已。

#### 参考文献

- [1]刘坤一致蔡钧电(1898年9月22日)[Z].
- [2]蔡钧致盛宣怀函(1898年9月23日)[Z].
- [3]郑观应致盛宣怀密函(1898年9月22日)[Z].
- [4]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458卷)[Z].
- [5]盛宣怀.寄香帅(1898年9月25日)[Z].
- [6]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8年10月29日)[Z].
- [7]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致经君莲珊书(第十五卷)[Z].
- [8]盛宣怀未刊资料:“郑观应致盛宣怀函”1899年6月22日[Z].
- [9]经元善致梁启超函(1897年11月21日)[Z].
- [10]经元善.上总署转奏电禀.经元善集(309)[Z].
- [11]大清德宗实录(458卷)[Z].
- [12]李鸿章.李鸿章致盛宣怀电.1900年2月19日[Z].
- [13]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十五,电报十二,“寄李傅相”1900年2月21日)[Z].
- [14]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Z].54.
- [15]夏东元.郑观应传[Z].185-186.
- [16]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奏议(卷31)[Z].
- [17]郑观应[M].183.

## Comment Simply on the Zheng Guan-ying's Faithless Actions.

LI Xiang-dong

( Historical Cultural Colleg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as famous for his bourgeois reformism, had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The complete system of his reforming thought was the guide that raised the slogans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However, this great thinker had two things that made men not understood and inspired cold disdain, that is to say, which were his two stain marks of his life.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Jing Yuan-shan; reformism; modernization